

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风险及其治理

■ 张 瑜 李俊贤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4)

【摘要】青年对其社会注意力的分配反向建构着其自我理解和社会觉知,因此必须全面把握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存在论变革及其风险。脱域加速与数字在场的本体变革、内容海量与结构复杂的数据变革、流量驱动与算法规训的机制变革,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新情境,导致了较为普遍的注意力分散、短缺和失衡。这一新注意力结构和运作方式有可能会引发青年的自我认同风险、社会交往风险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对此,不仅需要在个体层面提升青年媒介素养,还应当进行交往共同体建设、数字治理制度化建设等社会和国家层面的总体性筹划。

【关键词】人工智能 青年 社会注意力 风险治理

DOI:10.16034/j.cnki.10-1318/c.2024.04.006

注意力是毋庸置疑的心理学名词,但对社会注意力的探讨则涉及传播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内蕴着复杂的权力结构和文化过程。研究青年现象和青年问题须重视和引入青年社会注意力发生场域和分配结构等视角,因为青年的自我理解和社会觉知之“惯习”就形成于社会注意力的需求与供给、行动与控制、自主与外塑的复杂运动场域之中。近年来,随着平台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式发展,学界对注意力及社会注意力的相关研究有所增多,在概念内涵、机制机理、社会影响与治理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不过,这些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研究角度分散,多侧重于政府、互联网平台等组织实体,对青年社会注意力直接展开分析的较少;二是在机制机理方面,更为侧重对网络主播、网络文学、抖音等具体案例的考察而并未形成总体性的探究,对人工智能时代青年成长环境之“存在论变革”分析较少;三是多从注意力经济的角度探究其社会影响并从媒介自律、媒介素养等方面进行注意力风险治理,对青年社会注意力的风险样态和治理措施研判不全面、不到位。基于此,本文将围绕青年社会注意力这

收稿日期:2024-05-11

作者简介:张瑜,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高校德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网络意识形态;

李俊贤,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3年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思政课教师网络育人能力提升研究”(课题编号:23JDSZKZ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视角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主体时空感知、社会关系和行动模式的形塑机制,探讨智能化环境下青年的网络化生存风险与挑战以及面向人与技术和谐发展、互促共进的治理路径。

一、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基本境遇

如马克思所言:“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因此,分析青年的社会注意力分配必须从其发生的主要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入手,尤其要重视人工智能时代的技术人工物——人工智能在“行动者网络”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一)本体变革:脱域加速与数字在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2]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的社会注意力有着区别于以往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的本体性变革:一方面是所谓人类认识的感性直观先验形式之时间、空间的变化——时间加速和空间脱域;另一方面是深度数字化的主体“新感性”在场形式。由是观之,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创新,而是一个新媒介时代的号角。“人工智能时代”的提法正是对人工智能技术或媒介的驱动性力量与划时代意义的鲜明指认。这是探讨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所必须着眼的崭新图景,也是形塑当代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先在结构。

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因其具有革新意义的技术集成驱动了经典牛顿力学时空关系向着新型量子时空关系转变,重塑了社会生活新图景。“绝对空间就是牛顿物理学和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意义上的空间;相对空间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意义上的空间,对应的就是现代哲学对认识论的一种拷问;关系性空间对应的是量子力学。”^[3]在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看来,时间和空间是紧密关联不可分割的先验形式和固有属性,突出的稳定性和秩序性规定和制约着人们的主体性发挥,人是在时间和空间既定的背景下展开的角色认知和社会行动。而量子时空则以高速、模糊、离散为主要特征。在这一时空关系下,线性机械的钟表时间向着多元高速的网络时间靠齐、物理空间逐渐服务于技术化空间景观的呈现和维持。因而,随着时空关系的变化,青年的注意力不仅面临着海量内容的考验,同时还面对着时空结构变迁对青年注意力结构、认知结构和实践能力的挑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时代加速推进着数字化转型之路,数字经济、数字化教育、数字劳动等都在不断呼唤着具有数字化技术和虚拟实践能力的“新感性”主体的生成。“速度在创造着属于它的时空和景观,因而也就在塑造着新的社会关系和心灵。不同的速度能够让人看到不同的时空和景观。”^[4]这一新主体的成熟过程注定面临着诸多的阵痛和考验,不仅有数字鸿沟提出的技术掌握考验,更有在媒介化时代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发展的能力素养和实践智慧考验。

(二)数据变革:内容海量与结构复杂

数据变革是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面临的最为显著的变化和挑战,主要表现为数据内容的海量化和数据结构的复杂化两个方面。海量化的数据构成对人们感觉系统、认知能力和选择能力的挑战,复杂化的数据结构隐含着数据鸿沟、信息茧房以及多元价值和利益冲突等风险。分析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状况和结构必须对这一构成性境遇进行考察。

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面临着海量数据内容的冲击。一方面,5G、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极大地促进了现实世界的深度虚拟化和数字化转型。在这一科技变革和产业革命背景下,我国的数字中国、智慧社会、数字经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数据资源得到充分涌流,得以高度流动和互联互通。另一方面,在大数据、超级计算、深度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集成式数字技术赋能之下,无论是个体主体还是互联网企业的数据挖掘、数据整合以及新数据创生的能力和速度都得到显著提升。不同类型、不同品质、不同诉求的数据信息往往一并涌现在个体或群体面前。因而,人工智能时代的青年所遭遇的数据总量呈爆炸式增长。这既为青年社会关系的充分发展和社会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遇,也不可避免地对青年的判断和选择能力造成极大挑战,引发广泛的信息过载和慢性注意力分散。

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还面临着复杂数据结构的冲击。一是数据生产结构的复杂化。在Web1.0时代,生产者主要是政府、企业等权威或精英群体主导并建设的门户网站,生产方式主要是PGC(专业生产内容),生产和传播呈现静态、单向和中心化特点。Web2.0时代,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应用和自媒体广泛普及,生产方式为UGC(用户生产内容),社会公众的话语权和主体性提升,由数据接受者变成数据生产者。网络空间活力非凡的同时也出现了众声喧哗的状况。而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逐渐投入使用,生产方式则逐渐向AIGC(人工智能生产内容)转变,智能化、个性化、灵活性的数据内容逐渐融入日常。二是数据消费结构的复杂化。在以往时期,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品质,而随着信息生产结构的变化,数据的准确性因加速脱域的时空结构以及感性化需求的释放所淡化。人们或囿于自己的需求偏好融入信息茧房或因为情绪优先而卷入“后真相传播”。三是数据所有结构的复杂化。人工智能时代,数据的重要性尤为凸显。数据从原来的商品定位向生产要素转变,并逐渐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实体资本。从根本上看,平台经济所占有的用户信息和个人数据其实正是用户所生产和提供的,然而在实际中却有可能被平台资本所褫夺而丧失主体性,在此情况下,青年的社会注意力分配就会被不合理的数据所有结构控制。

(三)机制变革:流量驱动与算法规训

在一般意义上,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分配是个体能动与结构运作的综合结果。不过,在不同媒介时代其具体运行有所差别。在前网络时代,人尚未脱离具体物理时空,注意力总是被日常生活的紧迫需要所萦绕。进入网络时代,人得以延伸进入网络时空,注意力可以投入海量的脱域信息。尤其是进入Web2.0以后,“人找信息”变成“信息找人”,注意力的有限性、稀缺性在信息洪流的冲击中愈发凸显,将注意力商品化、资本化的倾向逐渐成为形塑社会注意力结构的重要内容。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注意力的分配和运作机制所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的合谋。

一方面,流量驱动是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重要机制。注意力经济是人工智能时代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眼球经济”“爆款”“标题党”“直播带货”等耳熟能详的语词正是注意力经济的话语呈现,“流量变现”是注意力经济的目标旨归。在流量社会,重要的不仅是生产,还有消费;不仅是内容为王,还有吸引为要。在这样一种流量逻辑下,青年的注意力已经成为市场竞争和角逐的关键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青年充满好奇心与探索欲却又现实经验不足、

价值判断模糊,容易不自觉地扮演着平台“免费数字劳工”的角色,他们的注意力偏好和浏览记录为广告投放者和平台提供无偿数据训练和个人数字画像。另一方面,资本与智能算法技术的合谋是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鲜明特点。流量变现的前提是获取尽可能多的用户量和维持尽可能高的用户黏度,“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5]。而算法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时代注意力经济得以繁荣的重要依托。“算法推荐成为信息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6],奠基于超级计算、深度学习、大数据资源之上的智能算法技术不仅识别、迎合着目标受众和积极用户,还制造、规训着潜在用户的需要和偏好。置身于这样一种平台经济的“系统”座架中,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单靠个人自律着实难以辨识方向和重觅本真。

二、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的风险样态

青年社会注意力的分配方式反向建构着青年的自我理解和社会觉知,并进一步塑造其价值系统和行动逻辑。由于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注意力所面临的变革境遇,青年群体出现了注意力稀缺、分散和结构性失衡现象,在自我认同、社会交往与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新的风险挑战。

(一)自我认同风险

首先,虚拟化、加速化的感性实践挑战青年身份同一性。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自然的智能化演进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青年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弄潮儿的同时也面临着调和虚实冲突、处理加速信息的实践课题。一方面,青年摆脱了传统物理时空下具体条件和环境的约束,通过虚拟在场和加速实践得以在更为广阔和丰富的信息洪流中进行选择性吸纳,以全天候在线、多任务处理的新常态展开多重角色的扮演。这为青年社会关系的延伸和自我能力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和支撑。但另一方面,斑驳复杂的海量信息和频繁切换的角色身份也容易使青年既有的人格心理遭到冲撞并产生裂变,难以形成统一的行为模式和整全的自我观念,产生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整合性危机。

其次,碎片化、快餐化的信息资讯影响青年认知稳定性。“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7]强大的认知能力、稳定一致的认知结构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内在之锚。在人工智能时代,依托机器学习、生成式人工智能生产的信息资讯和短视频往往以短平快为特点,以即时流量为诉求,看似丰富多样、琳琅满目,实则多是情绪化表达和同质化内卷,思想深度不高,逻辑性不强。“过度的积极性还可以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资讯,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力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8]这样一种注意力消费结构不仅无法帮助青年拓展生命体验、更新观念认识、滋养精神世界,反而使得青年容易被浅表化、非理性观点和扁平化、单向度的认知结构所规训和同化。习惯于用眼睛看而非用脑袋思考、习惯于不思或浅思的受众群体在信息丰裕和数据过剩时代较为常见,思维的惰性和认知结构的僵化由此而形成。

最后,符码化、景观化的营销美学动摇青年价值自主性。青年的健康成长迫切需要建立稳定连续的价值感和意义感,而注意力商品的符码化、景观化营销正在不断模糊和动摇青年的稳定价值感。这一营销策略以数据和算法为手段,通过捕捉青年的网络数据痕迹进行心理和行为

分析,以数字符码编织的拟象世界和充满魅感的景观生产攫取青年的注意力。而智能算法的不完善、应用的市场导向性等因素对青年的价值自主性带来风险。一方面,算法所推荐的“理想生活”是一种抽象、驳杂、泛滥、炫惑的“二手生活”和景观化商品,它并没有真正从青年的成长需要和现实情况出发,也没有科学的价值根基和可靠的叙事逻辑。另一方面,“算法归纳会导致一种信息决定论,在这种决定论中,我们过去的点击流完全决定了我们的未来”^[9]。近些年来的“低欲望”“佛系”“躺平”“旷野文学”等话语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青年对媒介展演出的狭隘社会想象和功绩主义自我规训的另类突围。

(二) 交往异化风险

首先,注意力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青年交往能力异化。在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年群体更加习惯于在网络空间中寻找自我归属和社群关系,传统面对面的交流变成了符号互动,这里的交往节点不仅是社会个体,还有可能是社交机器人、大语言模型等。这种交互方式一方面拓展了青年的交往范围,另一方面使得不少青年的深度交往能力下降,比如长期沉浸互联网“网言网语”的青年在现实交往中却相顾无言,长期通过短视频进行微认知的青年却提笔忘字、论证乏力,更有甚者将网络作为逃离现实社交压力和关系束缚的乌托邦并沉溺于原子式的生存方式。注意力的无限延伸反向造成了“附近的消失”,青年对于自身所处具体社会关系往往缺乏了解意愿,反而执着于对有关“远方”事物的抽象言说和符号互动。在这样一种注意力模式下,青年的感知力和行动力很难得到真正的提高。

其次,注意力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青年交往目的异化。一方面,平台资本依赖技术优势和数据积累占据了庞大的注意力资源,使用该平台开展交往活动的青年群体往往无意识地扮演了免费数字劳工的角色,其交往的内容、偏好和使用痕迹都被工具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数据。另一方面,平台资本为了吸引多元化的用户和立体化的圈层,扩大其流量及影响力,往往会采取经济效益优先而忽视社会效益的营销策略,比如利用具有争议性的议题来吸引对此具有不同态度的群体。这样一种策略激化了社会对立,撕裂了社会共识,背离了社会交往的本真价值。长此以往,在算法规训和资本驱动的合谋下,青年自身也逐渐内化了这一功利化、实用主义的交往逻辑,即交往是为了获得更多注意力,为了成为“大V”,为了实现更大可能的“流量变现”等。在平台、使用者、生产者都为了这样的异化目的而自我规训的时候,本真的交往实践正在渐行渐远。

最后,注意力分配的不合理导致青年交往过程的异化。一是交往过程中感性化凸显,理性话语影响力下降。“后真相”新闻事件的不时发生其实就是感性化交往的体现。在关涉民生的讨论中,舆论往往出现情绪和立场优先于理性和事实的情况,表现出部分青年在交往过程中的理性不足问题。二是交往过程中“对立认同”现象明显。所谓对立认同就是“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的最迫切的形式。这是由于大家共有某种反对的东西而形成的联合”^[10],比如性别议题、饭圈文化等。这其实隐含着注意力资源争夺对交往过程的异化,偏执一端的情绪化、极端化叙事反而比理性平和之论更容易获得关注。不过,这样失真失焦的话题在集体狂欢、情绪宣泄之后往往只能是一地鸡毛,“部落化”“粉丝化”的背后损害和撕裂的却是公共利益和价值共识。研判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时,必须尤为重视对青年公共空间交往过程的引导和交往理性的培育。

(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一是意识形态操纵风险。技术在研发和使用过程中内化着一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价值取向。国际互联网的发展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转型产生一定的耦合关系,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不断交互迭代并谋求建立数字帝国主义的垄断地位。“急切性、即刻性和紧迫性,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经济的核心。我们只能浮于生活经验的表层,同时由于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加速,我们又不得不经历着过度刺激和慢性注意力分散的状态,这样的双重否定将(本可以赋予我们力量、行动能力和机遇的)知识从个体层面上夺走了。我们的力量和行动被限制在新自由主义体系的范围之内。”^[11]在人工智能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将数据和算法优势与政治意图结合,形成了一套“计算宣传”的意识形态操纵模式。计算宣传可以根据用户个性化数据绘制用户画像并精准推送蕴含意识形态话语陷阱的注意力产品。长此以往,用户就会无意识地“养成”被预设的价值判断,并不断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处于拔节孕穗关键时期的青年若长期浸染在“计算宣传”编织的经验视野和价值环境中很容易消解核心价值认同,动摇理想信念,阻碍健康成长。

二是意识形态解构风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是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挑战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网络智能化的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到了不小的冲击和解构。首先,数字化成为新的权力要素,主流意识形态的“能见度”变低。“在人工智能时代,数据与算法成为新的权力生产要素,谁拥有更充分、更优质的数据,谁掌握更先进、更高级的算法,谁就可能拥有更多或更大的权力。”^[12]要警惕这种以“技术置换权力”的机制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构成的风险挑战。其次,分众化的生活政治成为新的话语焦点,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度降低。意识形态的重心向社会生活领域扩散的状况导致以体系化、精深化为特征的主流思想理论在“分屏”和“加速”时代影响力下降,青年群体的社会兴趣和注意力不断地漫射和分散。最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滞后导致其话语空间被多样化社会思潮所挤压和遮蔽。包装精致、新奇和具有情绪煽动力的消费主义、泛娱乐化、民粹主义等思潮在网络空间往往更易博取青年的注意力资源并对他们在学校教育中养成的认知和价值结构产生冲击。同时,国际舆论场上我国的话语传播和国际形象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妖魔化解读。

三是意识形态撕裂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既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机遇,也带来了风险。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数字化转型后,更容易扩大其群体关注并形成网络社群认同与组织动员,并通过人工智能筛选和规训用户,造成更大的影响力。比如,通过监控青年注意力的投入方向积累用户数据,通过标签化、个性化推荐机制迎合、极化青年的价值偏好和归属需要并反复强化这一拟态认知的“回音壁”和“过滤泡”;通过制造差异化符号认同和虚假需要养成和绑定更为广泛异质的趣缘圈层;通过制造非此即彼的二元化议题和激化人民内部矛盾力图把所有人卷入注意力收割的漩涡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认知逐渐窄化和单一化,社会共识被逐步消解。制造社会撕裂是西方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标之一,反华势力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新的意识形态利器,通过双重标准的人工智能问答、“深度伪造”的谣言和假新闻、社交机器人持续深耕反华议题等,企图把互联网空间变成易燃易爆的意识形态“火药桶”与颜色革命的“最前沿”。

三、人工智能时代青年社会注意力的风险治理

通过对青年社会注意力问题的分析,可以发现青年社会注意力分配的时代处境及其所引发的风险样态的关联贯通性。基于此,对青年社会注意力风险的治理须坚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在个人、社会和国家等层面多措并举、协同发力。

(一)个体层面: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提升注意力分配的主体意识

一是增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能力素养。个体注意力稀缺、分散和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媒介能力和素养不足。青年要不断学习和提升,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的“为我所用”而非“人为物役”,让这一技术赋能自己的学习、生活和事业成长。其一,了解其技术原理和社会影响。人工智能技术并非某一种特定功能指向的技术,而是技术系谱和集合。应主动了解和学习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理论,辩证认识人工智能技术对人和产生的影响,避免盲目崇尚技术逻辑。其二,提升应用能力和实践智慧。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度嵌入青年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一方面,青年需要提升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利用技术赋能提升学习能力、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另一方面,青年要认识到资本与技术合谋所造成的注意力异化风险,努力提升思想理论自觉和网络生存智慧,让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是提升对注意力资源的价值自觉。个体对注意力资源的认识模糊是导致其注意力风险的重要原因。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攫取用户注意力资源的平台应用越来越多,其运行与维系都隐含着注意力诱导机制,青年容易在大数据算法的规训下,被动追随一轮又一轮汹涌的热点和议题,被各种声音持续轰炸以致疲惫倦怠却又强迫不停“吃瓜”。在海量信息之中“高强度冲浪”以致信息过载的青年,不仅不能收获系统的知识和可靠的信息,反而会损害其深度思考能力,成为认知浅薄、价值迷茫、缺乏批判和创见的单向度之人。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青年必须增强对注意力资源稀缺性、宝贵性的认识,强化自身作为注意力所有者的主体意识,提升规划和分配注意力的主体性。“了解所处的注意力经济秩序,意识到各类媒体平台注意力竞争的目的、手段,进而规避注意力掠夺对自身造成的损失”^[13]。

三是优化注意力分配,锤炼过硬本领。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青年如何分配这一有限资源以获得知识、能力和价值的提升关乎人生和事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14]在当下,网络化蔓延和智能化扩张的注意力经济正在大量侵占青年的自由时间,以“休闲娱乐”“丰富体验”“寻找共鸣”等名义制造同意实则行价值攫取之实。一方面,青年要自觉统筹注意力资源的分配,平衡好各项事务上的注意力分配结构,把注意力资源投向更有助于自身长远发展的对象和领域,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本领和综合素质。“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15]另一方面,青年要主动适应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的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保持对自身成长的长期持久的专注力,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本领,提升创造性思维和创新素质,在回应时代呼唤和国家战略需要的过程中实现人生价值,创造美好生活。

(二)社会层面:坚持共同体理念,推进交往共同体建设

一是坚持“共建”理念,以交往素质和能力提升为重点打造真实的交往共同体。青年社会注意力风险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交往异化,这一异化既与青年群体直接相关,同时也关涉到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复杂互动网络。因此,优化人工智能时代的交往生态必须坚持共同体理念,广泛动员网民共同参与交往共同体的建设。共建的重点就是提升交往空间和实践场域中诸行为者的交往素质和能力。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媒介素养参差不齐,交往中一方面会由于数据鸿沟、技术门槛而出现数字难民、数字遗民等区隔和排斥现象,另一方面则会由于技术依赖和资本规训而产生交往的工具化、符号化和去中心化倾向。其中,数字区隔和排斥现象会加剧群体交往素质和数字权利的不均衡,不利于普遍交往的公共空间之生成;交往的工具化、符号化和去中心化则会降低交往的正向功能,造成数字成瘾、虚实混淆、群体极化、信任危机。因此,必须在社会层面开展面向多元行动者的有组织、有重点的教育培训和实践指导服务,促进人工智能时代社会整体交往水平和实践创造能力的进步。处在交往空间中的多元主体,特别是青年群体应积极学习和掌握新技术手段和新交往模式,利用大数据、算法推荐和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生产和传播优质精神产品,提升网络空间受众的审美层次和共同体意识,传播和壮大社会正能量。

二是坚持“共享”理念,涵育交往理性,以矫正交往目的异化。交往是人的主体性活动和根本性需要,是人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动力,是人的社会性本质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交往服务于优良生活的培育、公共品格的塑造、人的社会关系与交往能力的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是人们获取信息、联结情感、沟通思想、共享意义的公共空间和精神家园。这一公共空间和精神家园既由人们的交往行为所塑造,也反作用于个体的交往实践。可以看到,在青年社会注意力结构形塑和资源分配的市场化博弈中所形成的交往目的异化,比如沉溺虚拟享乐的泛娱乐化目的、炮制争议话题博取流量的工具化目的、制造消费奇观和虚假需要的功利化目的等,其中都渗透着迥异于交往理性的资本逻辑烙印,并不能让交往和实践的成果惠及全体。因此,在建设网络精神家园、推进网络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和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激浊扬清和凝聚共识的作用,涵育积极健康的交往价值观,以提升精神境界、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公共精神的价值理性,矫正注意力商品化、资本化过程中出现的交往泛娱乐化、工具化、功利化取向,广泛汇聚向善向上的正能量,塑造良性互动的交往生态。

三是坚持“共治”理念,以多元主体协同、综合治理手段规范交往过程。社会交往风险并不是依靠某一技术环节改善或特殊类型主体自律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关涉到人工智能时代文明范式变革和治理能力提升的总体性问题,必须坚持“共治”理念以规范交往过程,“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16]。以平台经济为例,有研究者指出,平台已“成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增殖的‘中介’,平台似乎已经处于一种支配地位,正在主导整个经济体系”^[17]。这里的交往过程涉及平台开发者、管理者、生产者、消费者等多主体,并关乎资本运作、组织形态、劳动方式等多重变动,要规范交往过程就离不开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手段的综合:平台开发者应遵守法律规范和社区公约设计算法并履行信息把关和价值引导的责任;平台管理者要制定积极而稳健的

发展战略,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内容生产者要破除唯“流量”是图的狭隘思想,利用技术优势生产优质产品以提升竞争力;消费者和广大网民则应当提升信息选择和鉴别能力,发挥主动监督作用和需求导向功能。这是矫正人工智能时代交往过程异化的重中之重,也是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明建设对于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所提出的要求和期待。

(三)国家层面: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化

一是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化解意识形态操纵风险。“技术的发展问题最终是政治问题。”^[18]新自由主义经济推出的技术并非价值中立,它由资本竞争的强制进化逻辑所催生,并服务于攫取剩余价值和获得话语霸权的数字帝国主义战略。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人工智能领域存在的不足是意识形态操纵风险形成的重要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赋能计算宣传,不仅操控涉华国际舆论、损害我国国际形象,同时也设置话语陷阱扰乱国内舆论场。突破这一“技术—话语”困境,不仅要在策略层面激活互联网企业和科技公司的创新创造活力,更要在充分发挥党和国家在领导和推进重大前沿科技方面实现突破的制度优势,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的突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核心和标志的新质生产力是国家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提升的重要引擎,有助于推动数字时代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自立自强必将为制度优势的发挥、意识形态安全的维护、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设提供更加充分的保证,必将为准确、全面和完整地诠释和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和道义特质提供坚实保障。

二是推进数字治理制度化,化解意识形态解构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及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系统完善的孵化环境,若任由平台资本无序扩张并侵占数据资源,不仅无益于科技的发展升级,反而会透支社会活力、迷失发展方向、错失历史机遇。数据和算法是平台经济再生产的重要动力,也是国家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身份认证权是一种基础的、根本的、不可转让的国家权力,而行为识别权是国家可赋予市场力量的受限权力。”^[19]而在当前平台经济的运行中,行为识别的受限权力实则发挥着身份认证和数据监控的效果,其算法也在日用不觉中嵌入个体的生活世界,并发挥着意识形态规训效果。面对此种公私权界的模糊和僭越风险,国家应发挥对平台经济、尤其是其数据和算法的治理,坚持“党管传媒数据”^[20],确权数据结构并开展算法审查。2022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以及2023年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中组建的国家数据局就是对算法、数据等关键要素进行治理的重要举措,充分反映了国家对于人工智能技术及其社会化应用的高度重视。随着技术创新不断发展演进以及在社会应用中各种新问题的出现,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应用的规制需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优化。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化解意识形态撕裂风险。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和应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成果,是生产力水平不断积累量变之后的飞跃,应当而且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升社会实践水平。然而一些西方国家却以资本利益至上为目标,垄断科技发展最新成果加速资本再生产,从而攫取高额垄断利润。这必然会导致资本权力独大、劳动控制和剥夺加剧、数字鸿沟和分配不公,加剧社会分化、政治极化和意识形态撕裂。技术引发的社会困境与技术的资本主义运用之间具有必然关系,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困境源于其对单纯技术路

线的路径依赖,即追求以技术的跃迁来延长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却不触及愈演愈烈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有学者指出:“技术困境不是欧洲的特有命运,而是一切按照欧洲模式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命运!”^[21]在当前新的形势下,我们要紧紧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抓住科技革命的历史机遇,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寻求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化道路”^[22]。我们要始终把牢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以制度完善、经济改革、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守正创新来化解技术社会风险,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激发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能,汇聚起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上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参 考 文 献]

-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545页。
-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 [3]张一兵 大卫·哈维 杨乔喻:《空间塑形与非物质劳动——张一兵与大卫·哈维对话之一(2017)》,载《人文杂志》,2017年第11期。
- [4]胡翼青:《论时间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载《新闻记者》,2020年第8期。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 [6][13]韩丽颖 李承秋:《“无意识”与“有选择”:大学生注意力分布样态及机制——基于大学生关注的热点话题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3期。
- [8][15]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21、22-23页。
- [9]伊莱·帕里泽:《过滤泡:互联网对我们的隐秘操纵》,方师师 杨 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02页。
- [10]肯尼斯·博克 等:《当代西方修辞学:演讲与话语批评》,常昌富 顾宝桐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页。
- [11]罗伯特·哈桑:《注意力分散时代:高速网络经济中的阅读、书写和政治》,张 宁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9页。
- [12]梅立润:《技术置换权力:人工智能时代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变化》,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32页。
- [16]《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57页。
- [17]蔡万焕 张紫竹:《平台经济发展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挑战及其启示》,载《学习与探索》,2022年第11期。
- [18]赵汀阳:《人工智能的神话或悲歌》,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84页。
- [19]欧树军:《灵境内外:互联网治理简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37页。
- [20]张春发 郭明飞:《“党管传媒数据”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重要意义、境遇审视和实践路向》,载《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
- [21]胡大平:《从机器体系到技术社会:马克思的视角》,载《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7期。
- [22]洪燕妮:《数字资本主义批判与中国式数字文明建构》,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3期。

(责任编辑:孔 庚)